

## 第一章

# 法蘭克福學派

社會研究所創立於1923年。這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庫從一個力爭解決俄國革命後工人運動面臨的實際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成長起來，得到了赫爾曼·韋爾(Hermann Weil)的資助。他是一位見多識廣的商人，在阿根廷穀物市場上大發其財。這筆資金是在他的兒子費利克斯的敦促下給出的，後者自認為是「客廳裏的布爾什維克」。

韋爾(Felix Weil)的密友包括格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經濟學家，他本可以成為研究所的首任所長。然而，格拉赫不幸死於糖尿病。格呂堡(Carl Grünberg)於是代之接管。他創辦了研究所的第一份正式出版物《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史文庫》，其中發表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和哲學》(1923年)。加入格呂堡行列的有格羅斯曼(Henryk Grossmann)、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斯特恩伯格(Fritz Sternberg)和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們都是共產主義者。他們依然懷念1918–1921年間的民主工人委員會，也設想建立一個德意志蘇維埃共和國。他們的

思想工作提供了有關資本主義的崩潰、國家的新角色以及帝國主義的大量不同觀點。但這個群體隨後消失在幕後，研究所的總體方向也在1930年發生轉變。就在這一年，霍克海默組成新的核心集體，作為法蘭克福學派逐漸為人所知。

## 核心集體

霍克海默出生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富有的猶太商人家庭。他在早年求學時期並無過人之處，於是離開高中，在父親的紡織廠做學徒。然而，在1911年，他結識了波洛克，波洛克將他引入哲學和社會科學，並成為他一生的朋友。霍克海默在一戰後完成了高中學業。他淺嘗共產主義，在法蘭克福大學期間學習了眾多科目，最終寫成一篇關於康德《判斷力批判》(1790年)的學位論文。

霍克海默在擔任所長之前很少發表作品。這在希特勒1933年勝選後發生了變化，他當時正忙着將研究所從法蘭克福遷往日內瓦，隨後搬到巴黎，最後遷址於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他在20世紀30年代的文章致力於將批判理論與其哲學上的競爭對手區分開來，同時闡明自由資本主義如何通過建立極權主義的心理、種族和政治基礎背叛了它的初衷。其他討論大眾文化、工具理性和威權國家的作品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經典著作《啟蒙辯證法》(1947年)鋪平了道路。霍克海默的想法在數年



圖2 法蘭克福學派的三位領軍人物：霍克海默(左)、阿多諾(右)和哈貝馬斯(後)。這是他們唯一的一張合照

間無疑發生了變化。然而，他始終專注於苦難的影響和個人經驗的解放的可能性。

霍克海默也一直是跨學科研究的擁護者。在他的領導下，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彌合規範性理論與經驗性工作之間的鴻溝。他在1930年的就職演講強調了這一目標，甚至在流亡期間，霍克海默還為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編輯了一部多卷本跨學科研究課題，即「偏見研究」叢書。它包括馬辛(Paul Massing)出色分析德意志帝國反猶主義社會根源的《破壞的綵排》(1949年)；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和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n)的《騙人的先知們：美國煽動者的手法研究》(1950年)以及阿多諾和一眾研究者的經典著作《權威人格》(1950年)。

俄國革命和德國1919年「斯巴達克團」反叛點燃了霍克海默對於激進主義的熱情。但斯大林的清洗和恐怖機器的出現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霍克海默最終不僅與共產主義決裂，也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甚至在將研究所遷回德國並於1951-1953年擔任法蘭克福大學校長之前，他在政治上便已經轉向右翼。霍克海默最終反對阿爾及利亞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支持越南戰爭，並且斥責1968年的抗爭。

這一時期，他對於否定苦難的關注發生新的轉變。通過回顧禁止描繪神性的《舊約》，他開始相信，此時或許只有通過對現實的全盤否定和對解放的渴望，才能保存反抗觀念。神聖性——或者更進一步說是超脫塵

俗——成為對抗世俗的優勢。他將對啟蒙運動的批判推向極致。朋友們注意到他對天主教興趣漸增。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所有聯繫都被斬斷。當霍克海默在78歲離世時，批判理論已然岌岌可危。

弗洛姆在早期便是霍克海默的一位密友。弗洛姆的專長是心理學，但他也深諳神學問題。事實上，他與第一任妻子弗里達·賴希曼在柏林建立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就被稱為「摩西五經治療所」。弗洛姆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並且在思想上勇往直前：他是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思想聯繫起來的先驅之一。然而，弗洛姆如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他留名於世通常是由於他那些更具學術性的批評家眼中的「如何」書，如《愛的藝術》（1956年，為大眾文化表現愛的方式提供了一種負責任的替代選擇）；「樂觀」書，如《人心》（1964年，抗衡對於西方文化的憤世嫉俗的攻擊）；以及所謂的關於國際事務的粗淺研究，如《人性會佔優勢嗎》（1961年，明智地呼籲禁止核武器並緩和冷戰思維）。弗洛姆的《逃避自由》（1941年）因對於極權主義的透徹分析而被人們銘記。但他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1973年）中所作的重要研究卻被不公平地遺忘了。

弗洛姆在一個正統的猶太家庭中長大，從孩提時期便受教於博學的拉比，如尼赫邁亞·諾貝爾，尤其是薩曼·巴魯克·拉賓科。他的學位論文是《猶太律法：猶太離散社群的社會學研究》（1922年），討論宗教主題的

最早作品包括《安息日》(1927年)以及帶有馬克思主義轉向的《基督的教義》(1930年)。儘管他在20世紀20年代接受了無神論，但對於宗教提供的心理訴求和道德衝動的興趣從未完全消失，他在《像上帝一樣存在》(1967年)中對《舊約》做出的人文主義的新詮釋則引起了公眾的共鳴。弗洛姆發展「唯物主義心理學」的嘗試折射出批判理論對全面社會轉型的最初承諾。對精神分析的實踐性的強調，以及與反抗壓迫和促進人文主義價值觀的聯繫，成為他職業生涯的標誌。

弗洛姆於1962年協助創辦了墨西哥精神分析協會，並成為拉美精神分析學發展歷程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弗洛姆堅決反對越戰和美國的帝國主義，支持無數進步事業，提倡一種非官僚主義的參與式「社群社會主義」。他無疑也是法蘭克福學派中最有文采和最清醒的作家。弗洛姆最終在1940年同研究所決裂。核心集體中的其他成員顯然豔羨他的名氣，儘管也與他存在合理的政治和哲學分歧。直至人生的最後階段，他與研究所昔日的任何一位夥伴幾乎都沒有聯繫。然而，如同法蘭克福學派的任何一位成員，弗洛姆一直忠於批判理論的具體環節、人文精神和變革目標。

他的唯一一位真正的競爭對手是對新左派產生思想影響的馬爾庫塞。馬爾庫塞的政治履歷可以回溯至青年時代參與1918–1919年的斯巴達克團反叛(Spartacus Revolt)，1941年至20世紀50年代他供職於戰略情報局，

在制定美國對西歐的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並且具有進步性的作用。他早期的文章試圖將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性」或個人可藉以體驗社會現實的現象結構銜接起來。類似的關注貫穿於《黑格爾的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1932年)之中，該書為黑格爾在歐洲的日漸復興做出了貢獻，而《理性與革命》(1941年)對這位偉大思想家同批判理論的關係提供了一種影響深遠的解釋。馬爾庫塞也撰寫出版了一些出色的論文集。他始終瞭解藝術展現出的烏托邦潛力，但依舊關注實際的反抗形式，設想脫離既定秩序。不過，他這些理論上的冒險得到了各類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的補充。

1933年加入社會研究所之後，馬爾庫塞對自由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以及共產主義的衰退提出了疑問。他後來的著作預見了向發達工業社會的異化做出回應的新的社會運動。他對1968年的變革前景保持樂觀，也想像到隨之而來的保守派的反應。幸福意識、壓抑性的去崇高化以及大拒絕等概念都是由他傳播開來的。他的代表作《單向度的人》(1964年)真正意義上將批判理論帶到美國，通過它的引文將許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引入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始終認為自己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中做研究的。但他在方法上是靈活的，並且是文化轉型的預言家。馬爾庫塞向美國以及世界許多地區的一代青年激進人士展示了批判理論激進的政治要素。

相形之下，本雅明在美國一直不為人知，直至傑出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紐約客》發表了一份對他的介紹並將他的一批高質量的文章編輯為論文集《啟迪》(1969年)。在此之後，本雅明作為才華出眾且洞若觀火的獨特的思想家開始受到敬仰。他的另外一部文選《沉思》(1986年)強化了這種評價。本雅明的著作包括最初於20世紀30年代作為一系列報刊文章出現的親切的自傳體作品《單行道》(1928年)和《1900年前後柏林的童年》(1950年)、題為《德國悲劇的起源》(1928年)的有關巴洛克藝術的抽象研究以及擁有幾千處引文並為理解現代性提供了一座真正的鏡廊的未完稿《拱廊計劃》(1982年)。20世紀70年代晚期，隨着後現代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哲學主觀主義在美國得到新的普及，本雅明的名望迅速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研究論著大量湧現出來，他的《作品選》的每一卷幾乎都成為學術暢銷書。

本雅明來自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是家中兩個男孩之中的一個。他生於柏林，1919年在伯爾尼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成為流浪作家，從未有過一份穩定的工作。這給人一種感覺，即本雅明是夢想家的化身——這個不切實際的人有着使他超脫塵世的想像力。其作品的標誌是專注於語言的可替換性、記憶的本質以及日常生活中看似平凡的經歷，如吃飯、講故事和藏書。本雅明相信，所有這一切都突顯了更為廣泛的社會趨勢。他那

些明確屬政治範疇的著作並無創見，以1926–1927年的莫斯科日記為例，它們對他所處時代的重大事件幾乎沒有提出深刻見解。但當他研究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詩作、歌德的《有選擇的親和性》或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小說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本雅明關於建築、攝影、浪漫主義以及翻譯的文章同樣如此。他那些探討現代性對於個人體驗和日常生活的審美影響的文章，很是吸引人並具有煽情性。

受童年時期的朋友、日後成為猶太神秘主義傳奇學者的肖勒姆(Gershom Scholem)以及馬克思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影響，本雅明試圖將彌賽亞思想與對歷史唯物主義日漸濃厚的興趣融合起來。他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決定論，對它將無階級社會轉變為不可企及的理想心懷蔑視，他所關注的是喚回現實的形而上學經驗，並最終喚回未實現的烏托邦式的歷史可能性。這一事業因無法闡明解放的障礙以及根植在他的總體思想中的不一致性和互相排斥的假設而受到干擾。但毫無疑問，本雅明繼續啟迪、挫敗並教導着尤其是年輕的不受陳規約束的激進知識分子。他的著作在遍佈「廢墟」的年代喚起了流亡，而他在1940年試圖逃離納粹對法國的入侵時悲慘的自殺給他的人生打下了尤為戲劇化的烙印。

本雅明僅有的一名學生阿多諾體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的跨學科理想和歐洲知識分子的形象。他似乎無所不

知——而且比所有人都更清楚。阿多諾同樣出生於一個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意大利人。他於1924年獲得博士學位。作為曾經受教於偉大作曲家貝爾格(Alban Berg)並深受勛伯格(Arnold Schönberg)影響的音樂學家，阿多諾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編輯過一本音樂雜誌，後來為托馬斯·曼《浮士德博士》(1947年)的音樂理論章節提出過建議。繼經典著作《新音樂的哲學》(1949年)之後，他還對貝多芬、理查德·瓦格納以及馬勒等偉大作曲家進行了闡釋。

阿多諾也是一位敏銳的文學兼詩歌評論家，並且可以說擁有那個時代最耀眼的哲學頭腦。他專注於否定辯證法概念，深深懷疑所有體系和對於敘事的傳統理解，決心闡明文明固有的缺陷性，並拒絕任何將個體與總體聯繫起來的嘗試。

阿多諾將這些主題編織到他自己那包羅萬象的哲學敘事之中。但他也從事實證研究。阿多諾關於廣播電視的研究闡明了公認的簡單娛樂的意識形態影響，對其關於現代社會的權威和順從趨勢的研究做出了補充。他還是撰寫論文的真正高手。他的《論流行音樂》(1932年)揭示了商品形態對體裁的影響，而他對於貝克特、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深刻且新穎的詮釋以對經驗的重新理解顯示了他更為廣泛的興趣。

阿多諾不時論及政治問題，但他始終畏懼群眾運動。否定本身就具有價值，他將反抗等同於維持個體和

社會之間的「非同一性」。阿多諾對當代有關批判理論的各種理解產生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沒有哪位思想家能更好地展示對自由之光的堅定信奉。

哈貝馬斯也有必要稍作提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這位最傑出的學生成為法蘭克福學派所有思想家中最多產的一位。他的著作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宗教，而他的論文從對哲學典籍的闡釋延伸到對當代問題的評論。如果說他的早期作品曾對批判理論做出過重要貢獻，那麼他的思想路徑最終卻將他引向新的方向。

法蘭克福學派其他成員未曾有過的納粹主義之下的成長經歷，使哈貝馬斯對法治和自由民主深信不疑。他對話語操縱和「未失真的溝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的重要性的關注，也帶有這種特徵。這些主題貫穿在他的所有論著之中。作為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儘管從未參加任何極端主義派別，他早期的作品還是提供了關於歷史唯物主義、制度合法性以及理論與實踐關係的批判性思考。相比之下，哈貝馬斯隨後的作品越來越多地陷入分析哲學。它們堅持要求有根據的主張、形成系統論證並提供關於自然和科學本體論特徵的描述。一項持續的爭論是，它們在多大程度上遠離了批判理論。事實上，要做出這個判斷，就需要考察使最初的事業充滿生機的那些動力。

## 尾聲

法蘭克福學派的特點在於多樣性的統一。核心集體的每一位成員都與眾不同。每位成員都有其特殊的興趣以及獨特的思想優勢和缺陷。但他們都專注於同一組主題和問題。核心集體中的成員都未曾將自由與任何體制、集體或傳統聯繫起來——他們也都對擁護既定秩序的思維模式表示懷疑。他們都試圖通過引入新範疇去解決新問題。他們手中的批判理論以思想上的大膽和實驗性為標誌。對於他們而言，最主要地，批判理論始終是個方法問題。霍克海默說得很清楚，他寫道：「批判理論在其概念的 formed 和發展的各個階段都非常自覺地使人類活動的理性組織成為其關注點，其任務是加以闡釋並使其獲得正當性。因為該理論不僅關注既定生活方式所強加的目標，也關注人及其全部潛能。」